

“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

革命

想象与 叙事传统



人民出版社

“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

革命 想象 与 叙事传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姜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ISBN 978-7-01-010758-5

I. ①革… II. ①姜… III. ①革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546 号

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

姜辉 著

责任编辑：胡喜云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2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0758-5

定 价：36.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一、研究对象	1
二、研究现状	3
三、研究意义	6
第二节 方法论思考：作为理论视角的互文性	7
一、理论概述	7
二、研究视角的确立：互文性视域中“红色经典”的历史诗学 问题	15
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预期目标	25
一、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25
二、研究对象的范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28
三、研究设想	30

第一章 革命话语的主题变奏与美学表达

第一节 苦难的代价：革命叙事中的成长模式	32
一、成长仪式：分离—考验—再生	33
二、话语重构：从失落到皈依	36
三、叙事隐喻：生命象征与历史寓言	40

第二节 自我的超越：革命叙事中的崇高形象	44
一、人与自然：力量之美	45
二、身体美学与暴力叙述	50
三、完美人格与生命圣化	55
第三节 牺牲的意义：革命叙事中的死亡美学	59
一、革命与牺牲：死亡情境的模式再现	59
二、叙事策略：死亡话语的诗意改写	63
三、生命献祭：死亡价值的意义建构	68

第二章 工农革命主体的身份确立与类型定位

第一节 工农阶级自我身份的确认与革命主体身份的错位	73
一、主体或同盟：工农革命模式与无产阶级主体的身份置换	74
二、启蒙与被启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	80
三、身体错位：革命女性的性别身份变异	87
第二节 农民父子形象的对照模式与农民革命的象征结构	92
一、对立或承继：革命叙事中的农民父子关系	93
二、同一或裂缝：农民想象与农民两重性的象征结构	96
三、从启蒙到革命：父子权力等级秩序的重构	100
第三节 革命军人形象与“兵”的身份叙事	104
一、“兵”的形象：革命军人的类型化书写	105
二、“兵”的演绎：“兵”的知识分子化与“兵”的农民化	111
三、“兵”与战争：“兵”的身份意义与“兵”的叙事修辞	116

第三章 阶级斗争场景的艺术构思与激情想象

第一节 工农群众革命暴动图景的历史重现	122
---------------------------	-----

一、暴动想象：压迫与反抗	123
二、群氓的时代	127
三、工农群像与群众英雄	131
第二节 斗争一翻身：农民群众斗争地主情境的激情演绎	136
一、乡村想象	137
二、斗争程式	141
三、群体性格	145
第三节 阶级矛盾—路线斗争：合作化叙事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想象	153
一、叙事结构与阶级斗争的泛化	153
二、人物类型：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	158
三、矛盾设置：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	163

第四章 革命时代爱情的浪漫表现与格式法则

第一节 革命与爱情的情节复述与再现	169
一、公式：“革命+恋爱”的叙事谱系	170
二、形态：“革命+恋爱”的多重表述	174
三、意义：革命·身体·传播	178
第二节 主体身份的迁徙与爱情的格式化	183
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政治之恋	183
二、精神导师与启蒙对象的同志之恋	190
三、才子与佳人/英雄与美人的传奇之恋	200
第三节 文学叙事与符号权力	207
一、政治权力与文学合法性	208
二、政治权力在文学中的运作	210
三、文学对权力的突围	212

结语：范式的意义——“红色经典”叙事的模式化与“左翼经验”

一、“红色经典”模式化叙事的成因	215
二、“左翼经验”及其范式意义	219
三、“红色经典”叙事对“左翼经验”的接受	223
 附录一：左翼主要作家基本情况	 229
附录二：“红色经典”主要作家基本情况	238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57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一、研究对象

“红色经典”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关于“红色经典”的概念和指涉的时限，说法不一。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①有学者将其完整表述为：“‘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

^① 余志平：《关于“红色经典”的几点思考》，《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① 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20世纪40-60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并正式将其命名为“‘红色经典’丛书”。2004年5月23日，由中国文联等主办的“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提出，“红色经典”指的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产生的大量反映时代、对人民群众有重要影响的一批小说、戏剧、电影等作品”。几乎与此同时，官方给出了指令性定义：“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② 可见，关于“红色经典”的时间界限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它们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尽管学者如陈思和、董健以及刘勇都对“红色经典”的概念是否成立提出了强烈质疑，^③ 但他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红色经典”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它不仅已经深植于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生道路。到1980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促使人们对“红色经典”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环境的开放，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和传媒隐性之手的操纵下，“红色经典”被注入了新的世俗化的阐释，成为在市场上再次掀起狂澜的文化消费品。

① 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②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2004年5月25日。

③ 陈思和在《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一文中认为，经典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检验，“要找经典作品”，“只能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参见《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8期；刘勇在《“红色经典”：虚假的命名》一文中对“红色经典”的概念直接提出质疑，认为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根本不足以成为“经典”，理由是其写作不是出自真正的“个体写作”，参见《文艺评论》，2007年第4期；董健在《五四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2002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中也对“红色经典”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参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二、研究现状

“红色经典”再度成为文化热点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重现了“红色经典”研究的价值。值得注意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

(1) 再解读与再评价。以李杨、唐小兵、程光炜等人为代表，另有董之林、蓝爱国、余岱宗等人。他们的论著侧重以文本为中心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点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或者单纯地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以及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①此外，宋剑华不仅分析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艺术表现特征，也总结了此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并启发人们对十七年文学的性质和历史定位进行价值重估。^②白桦则认为，十七年文学的理论突围、创作抗争以及在政治荫蔽下的艰难求生是文学生命与文学意志生生不息的顽强体现。^③赵学勇分析和整理了20世纪50年代经典小说文本正反并列的创作格局，一方面是大多数作品的政治异化，一方面是少量作品的个性坚守。^④近年颇有影响的论作还有湖南师范大学杨经建的基金项目“对‘红色经典’的反思与重释”的系列成果。

(2) 文化研究。张器友、朱晓进主要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角度评价

①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 宋剑华：《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经验教训》，《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

③ 白桦：《压力下的生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④ 赵学勇：《重读20世纪50年代小说经典》，《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了十七年文学，后者还首次把“政治文化”概念引入“红色经典”的研究中。^①另外，余宗岱概括了1950、1960年代“红色经典”中积极分子文化的基本特征，指出积极分子文化的叙事传达着当时的意识形态规划、建构人民文化生活兴奋区域和禁忌区域的明显痕迹。^②

(3) 叙事方法。程文超从叙事角度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叙事者，认为“红色经典”文本是文学叙事与政治期待的结合。^③董之林的《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一文，从文本分析入手，指出十七年小说新旧交融的特点以及对古代史传小说传统的借鉴。类似的文章还有程光炜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叙事”问题》^④。

(4) 审美表现。田中阳指出《创业史》和《红旗谱》体现的民族风格主要表现为一种阶级风格。^⑤陈美兰也认为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形成了新古典主义。^⑥叶世祥试图从政治与审美入手，认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把握中国现代审美问题的政治特性。^⑦王琳认为“红色经典”文学沿袭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艺的“诉苦”笔法，其文主要以《苦菜花》作为考察文本，兼及《暴风骤雨》、《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红岩》等作品，“试图还原一条诉苦运动的清晰轨迹”。^⑧

(5) 人物形象塑造。程光炜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不断被修改、变异和调整，显现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形态和类型，并

① 张器友：《要准确评价“文革”前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4期；朱晓进：《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② 余宗岱：《论“红色经典”中的积极分子文化》，《海南师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③ 程文超：《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叙事50年》，《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叙事”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⑤ 田中阳：《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小说与区域文化关系比较》，《求索》，1994年第3期。

⑥ 陈美兰：《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⑦ 叶世祥：《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倾向》，《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⑧ 王琳：《苦难的变迁——“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诉苦运动》，《文史哲》，2007年第4期。

将文本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分为三类：战士型知识分子形象、城市知识分子形象、政治运动型知识分子形象。^①另外，他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形象塑造的演进过程，并将丁玲、周立波、赵树理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作为当代文学农民形象塑造的前奏。其中，重点分析了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作家的创作得失。^②何平也分析了《红旗谱》中的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之间的渊源和关系，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的复杂关系。^③

(6) 跨时期研究。孟长勇提出，延安文艺是十七年文学的源头、雏形，十七年文学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壮大，二者同属于、统一于“社会主义人民文学”。^④高旭国历时考察了“红色经典”的发展历程，将1940年代作为“红色经典”的形成期，1950～1960年代为其繁盛期，1970年代则为衰落期。^⑤

总体看来；当前国内学界对于“红色经典”的研究，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方面，在以“启蒙现代性”为主要视点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描述中，“有意无意地用新的一元论定式，取代先前的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主题词的文学视野”，^⑥在这种叙述框架下，“红色经典”被遮蔽成为理所当然，其艺术独创性与审美价值也被完全抹杀。另一方面，在以当下的学术眼光试图为“红色经典”重新定位，发掘其内在蕴含的研究中，其成果又大都集中在“再解读与再分析”领域，研究方向主要表现为结合“红色经典”所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去发掘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作家思想干预及其作品审美制约的严重后果。应该说，这些学人及其论著，对“红色经典”审美特征的复杂政治原因、作家群体高度趋时的个人主观因素及作品文本的自身内在矛

① 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② 程光炜：《论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

③ 何平：《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④ 孟长勇：《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人文杂志》，1998年第5期。

⑤ 高旭国：《“红色经典”的三个历史阶段》，《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

⑥ 张志忠：《“红色经典”定位：资源再开发和再解读的必要前提》，《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盾，都作出了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严谨论证，并为人们客观认识这段文学历史的奇特经历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参照与思考基点。

三、研究意义

尽管学界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红色经典”的重新入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仍然显示了单薄和狭隘的一面：第一，他们大都将研究视野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似乎“红色经典”完全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这显然忽略了“红色经典”的文本完形历史，同时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割裂。第二，他们大多从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出发，强调“红色经典”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史价值，而忽略、轻视甚至抹杀和否定其本来的文学审美价值。第三，对于“红色经典”的文学叙事，他们大多强调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体制力量以及苏俄传统、民族古典文学资源等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而较少提及左翼文学乃至新文学传统的直接影响。第四，他们大多采用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或纯粹的形式主义批评，表现出研究方法的单一和研究视角的局促。

事实上，“红色经典”不仅是一种文学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运动规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孤立地去看待“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陷入纯粹意识形态的意念解构。当我们将左翼作家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茅盾、叶紫等人的作品，与柳青、杨沫、曲波、吴强、周而复、茹志鹃、陈登科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仔细比较研究，便能够发现，它们之间不仅客观存在着主题设置、题材选择、故事结构、叙事风格、人物形象以及审美特征的惊人相似性，而且这种文本的相似性还发展成不同的叙事模式并在“红色经典”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这充分说明，“红色经典”绝非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个文学历史的延续现象；广大“红色经典”作家并非是在进行所谓的艺术“创

新”，而是在缺乏与国外现代文学联系的前提下，对左翼文学文本的再加工与再生产。然而，传统的历史诗学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尽管也注意到了现代传统（包括苏俄文学）对“红色经典”生成的意义，却认为在文学经典历史序列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时的“放送—接受”的线性影响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过分依赖实证，从而拘泥于渊源、途径、传播的研究，把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视为一种简单、机械、直接的模仿与被模仿，而没有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接受影响的后文本“模仿了什么？修改了什么？前文本的文学元素为什么和怎样被吸收和转换？”等问题，从而忽视了“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分析。事实上，这种前文本与后文本之间影响与借鉴的互动关系恰恰是当今风行于西方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互文性”的表现特征。如此一来，一方面，从文学叙事的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研究，力求真正以文学的方式来考察和研究文学，从而摆脱以往“文学与政治”的僵化思维和固有视角，就有可能对“红色经典”的文学审美价值给予客观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变以往传统的影响研究视角为互文性视角切入对“红色经典”进行研究，不仅能充分认识和考量文学关系的复杂性，而且也能避免传统影响研究的窘迫和局限，灵活地揭示与发掘“红色经典”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基于此，首先对“互文性”作一次有意义的理论梳理，便成为论证“互文性”视角合法性、开启“红色经典”叙事研究的一条无法规避的路径。

第二节 方法论思考：作为理论视角的互文性

一、理论概述

“互文性”的理论渊源应追溯到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巴赫金的对

话理论以及 T. S. 艾略特的诗歌批评。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由相互差异的符号构成的系统，其意义的产生依赖于语言系统中发生的各种结合和联系的过程。文本不再是意义的载体，而是潜在的无数关系在此组合的空间，读者必须离开其显层结构，进入到它所具有的与其他作品和语言结构的关系之中才能得以理解。巴赫金则认为，小说语言是一种对话性语言，具有复调性、对话性和狂欢性，可以容纳多种话语类型，这决定了文本不会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独白空间，而是一个解构的客体，在解构的过程中重新建构，释放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多种意义，并与其他文本建立多种关系，“最起码，两种陈述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互为文本”。^① 而艾略特则反对文本意义的独创性。他认为，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秩序，其中，先前的经典文本一律为今人共享，每一件新作品的产生都受到以前全部经典的影响。在诗人（作家）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足以使他们永垂不朽的地方”。^② 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到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文本发生作用。显然，在索绪尔、巴赫金和艾略特那里，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已初见端倪。

作为当今使用最广而又误用最多的批评关键词之一，“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 1960 年代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一书，她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③ 这意味着：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

① [法]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9 页。

② [英] T. 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引自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 页。

③ [法]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47 页。

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换言之，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一个作者的作品，而且是它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这是文本的本质。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从社会、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大文本’中派生而来的，它们来自共同的母体，因此它们之间可以互涉、对比”。^①因此，所有的文本其实都具有某种文化文本性，或者说都不能独立于它所在的文化文本，而这个文化文本则包括所有的不同的话语、言语方式以及构成这种文化的体制结构。“互文”意味着欲望、历史、文本等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指涉，它不再被文本框囿，而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

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尔特进一步扩展了对互文性的理解。他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②在他看来，每一个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并引用此前已然存在的言辞的基础上完成的，都受到“先时文化”和“周围文化”的影响，前者从历时角度偏重于对文本所受不同时代文化传统的影响，反映出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延续性以及不同时代文化的差异性，也即是文化的悖逆与冲突；后者则从共时角度偏重于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反映出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性问题的关注。与克里斯蒂娃相比，巴尔特更好地将显性的文本存在与作为隐性存在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德里达则将文本视为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而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他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这无疑是在其对语言的解构主义思路是一致的。他说：“无论是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

① 罗婷：《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国外文学》，2001年第4期。

② [法]罗兰·巴尔特：《文本理论》，张寅德译，《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①这样,“在所谓的‘意义’已经完全由差异组织构成的程度上,在已经存在着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的文本网络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个‘单个术语’都是由另一术语的踪迹来标识的,所假定的意义内在性也已经受到它的外在性的影响”。^②能指的无限滑动彻底消弭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一切文字、话语、符码都处于互文性中。

美国耶鲁大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则以互文性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诗学误读”理论。他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③在他看来,一方面,互文性体现的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互文的各个因素都是作为构成文本之所以为文本的部分存在,没有来源物或影响物,写作者把各个部分包括自身编织进文本,使其成为一个话语网络。另一方面,传统又是误读的结果,当代诗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为避免其压抑和桎梏,总是试图以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误读”方式来贬低前人或否定传统,从而达到树立起自己“诗人形象”的目的。“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释。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读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历

① [法] 雅克·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② [法] 雅克·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③ [美]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70页。